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

田冠浩

内容提要 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理由。他一方面深刻意识到了个人自我决定、自由发展是文明的动力,因此接受了伊壁鸠鲁对唯物论个人主义的论证;另一方面,他又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个体自发性的限度,从而试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德国观念论对于“人类有计划地统辖社会”的思考。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以此成功综合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联合”两种不同思路,从而第一次为解释、引领当代社会变迁提供了一项兼具整体性与开放性的政治哲学纲领。

关键词 个人自由 自由联合 历史唯物主义 伊壁鸠鲁 马克思

田冠浩,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 130024

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构成了最为全面、深刻的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叙事,并至今依然影响着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走向。但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却并未在政治哲学维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们总是过多地注意这一学说包含的直接政治论断,而非产生它的政治哲学理由。一般来说,研究者们习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理由代替其政治哲学理由,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础对主客关系问题的解决。这种解读模式虽不乏深刻性,但却未必符合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因为马克思从未设想过脱离社会现实的本体论体系;马克思对所谓“本体论立场”的选择,恰恰是基于对政治问题的深沉思虑。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化的始作俑者是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等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点是,都没能看到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表述也最全面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1924年首次出版)。正是在这部作品中,马克思首次将“个人自由与社会联合”的主题拓展到了意识形态、所有制和生产力等新领域,从而全面改造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提问方式。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缺席,早期研究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建构是相当粗线条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虽然他们关于客观历史规律的承诺在革命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5ZDB00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与卢梭的理论传承关系研究”(13CZX004)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1609104)的阶段性成果。

员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在真正着手重建社会时,他们却经常遗漏马克思明确阐释过的一些政治目标和社会组织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效应,甚至一度误导社会决策。正因如此,在本体论解读模式之外,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就不仅是一项正本清源的学术史工作,而且对于重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引领现代文明的改革和振兴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博士论文》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

马克思虽然明确将自己的哲学界定为“唯物主义”,但是要真正把握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却远没有想象中容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被引用最广泛的历史唯物主义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对待唯物主义传统的态度主要是否定性的。《提纲》第一条即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1]。紧接着,《提纲》的第三条、第九条和第十条又提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直观的唯物主义……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中的单个人的直观”;“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2]。这些论述表明,在马克思看来,旧唯物主义诉诸于经验直观、决定论(并非全是决定论)以及市民社会中个人的狭隘欲望和利益,并未提供理解人类自由实践的积极原则。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抱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过多地关心自然而过少地关心政治”^[3];至于法国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在《神圣家族》中承认其汇入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但也仅限于列举其感觉主义、环境和教育的决定性、天生的社会性等观点^[4]。这些观点并不超出《提纲》批判的范围,而且主要是被空想社会主义者采纳,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差甚远。由此,研究者们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似乎马克思只从旧唯物主义继承了现实感这一起点,而他对于现代社会关系以及人类实践的理解则主要是借鉴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唯物主义”传统而言几乎完全是另起炉灶。在这种印象下,马克思与唯物主义传统更本质的联系,特别是这种联系的政治哲学意义实际上被长期忽视了。

进而言之,既然费尔巴哈和法国唯物主义都没有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真正具有政治哲学意义的新原则。那么,重新考察马克思的《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仅从该文本的献词部分就足以看出它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是马克思同时提供了一种比唯心主义更彻底地支撑现代自由的唯物主义方案。如果再考虑到,马克思凭借分析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所阐发的个人自由原则,在经过修正后又被《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作品重新确立为核心观念,那么断言对伊壁鸠鲁的研究给历史唯物主义带来了发端的机遇以及政治哲学方面最重要的理由就未必没有道理。

首先,《博士论文》表明,伊壁鸠鲁对决定论的拒斥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马克思提供了综合科学与伦理、客观现实与主观自由的最初示范。马克思注意到,针对德谟克利特的主张:“必然性是命运,是法,是天意,是世界的创造者”,伊壁鸠鲁却宣称:“被某些人当作万物主宰的必然性并不存在,勿宁说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另一些事物则取决于我们的任意性……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敞开着,这种道路

[1][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第504-506页,第334-33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页。

很多,它们是便捷易行的。”^[1]在伊壁鸠鲁的这些论述中,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与人类自由的真正联盟。因为,一方面,伊壁鸠鲁否认支配世界的绝对必然性,这就为自由意志留有了余地。另一方面,伊壁鸠鲁又进一步从个体“自主性”的视角说明了“偶然”。他将“偶然”阐述为抽象的、没有被“限制在严格的限度里”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这种抽象可能性“涉及的不是被说明的客体,而是作出说明的主体”;“存在的偶然”于是转化为“思维的偶然”^[2]。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主义正是以此接纳了个人对世界的自由阐释和行动,从而赋予了世界无限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其次,在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的观点中,马克思发现了从唯物主义视角论证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和深意。自西塞罗起,哲学史上常将“原子偏斜”看成是伊壁鸠鲁臆造的东西。但马克思却提出,正是“偏斜”赋予了原子纯粹的“形式规定”(本体论规定)，“在原子中未出现偏斜的规定之前,原子根本还没有完成。”^[3]对此,马克思解释说:如果原子只有“直线”一种运动,那么原子将成为丧失个别性和独立性的点,因为“一个苹果落下时所划出的垂直线和一块铁落下时所划出的一样”;原子的直线运动“纯粹是由空间来规定的”,原子由此被赋予了一个“相对的定在”,而这与原子作为世界本原的独立性是矛盾的。相反,伊壁鸠鲁宣称的“起因于原子自身”的偏斜,则否定了直线,否定了“一切相对性”即与“另一定在的任何关系”,从而实现了原子的“纯粹个别性”这一形式规定^[4]。显然,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对于原子偏斜和个别性的主张,适应了时代的变化,赋予了个人自由以形而上学的意义。也正因如此,马克思赞扬伊壁鸠鲁主义者卢克莱修把“原子偏斜”的思想用于说明“意识”,说明个人与一切限定性条件进行斗争和对抗,进而摆脱命运束缚的先验能力^[5]。不仅如此,对伊壁鸠鲁而言,“偏斜”不仅构成了使原子超脱于世界的形式规定,而且是原子相互“排斥”和“聚集”的原因;没有“偏斜”,“世界永远也不会创造出来”。马克思甚至发现伊壁鸠鲁用“排斥”来说明“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乃至政治领域的“契约”和社会领域的“友谊”^[6]。这些都使马克思最终确信,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表征了个人的意识和行动,后者正是以其自由、独立构成了充斥着“相对关系”的生活世界的绝对前提。

在此我们不难发现,虽然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仍然深受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但是在将伊壁鸠鲁原子论阐释为一种自由主义观点的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把“自我意识”安顿在了个体独立性这样一个绝对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博士论文》对于个人的独立性和前提性地位的认识在更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述中不仅没有被抛弃,而且始终被当做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7]。而《共产党宣言》更是明确要求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可见,对伊壁鸠鲁的研究,无论是在哲学基础方面,还是在涉及的政治原则和目标方面,都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思想作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共产主义为什么只能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马克思为什么选择唯物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按照本体论的研究思路,这个问题实

[1][2][3][4][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6页,第27-28页,第33-34页,第32-33页,第33-34页,第36-3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3、79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际是无法解答的。因为,如果说唯心主义不理解“实践”,无法把共产主义转变为人的现实,那么旧唯物主义同样做不到这一点。然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情却是,在“实践”观点诞生之前,马克思已经开始把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立场与“共产主义”的原理(早期表现为民主思想)联系到了一起。这种联系尚不能从“实践”观点解释,但却非常原本地呈现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意图,从而对我们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更本质的内容联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共产主义”属于那些最古老的政治思想,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它包含了有关人类共同生活的一系列基本诉求。比如,消灭财富的不平等、对分工实行集体调节;取消强权和劳动等级的从属地位;在合作与共享中培养同胞情谊;以及更本质的,通过共同生活使个人在物质力量和道德力量方面获得提升。对于这些诉求,大多数观念论(唯心主义)哲学家都表示衷心赞成。抛开对人类社会严格等级设定不说,柏拉图《理想国》的根本意图就在于指出共同生活是每个城邦居民的根本利益。柏拉图为此设想了在城邦“监护人”中实施的“共产主义”。城邦的管理者和保卫者被要求不占有私人财产且不生活于私人家庭,以便他们能够全心全意地献身公共事务,公平管理社会各领域,使“共同体达到它最高的完善”,并从中获得不关乎物质的最高满足^[1]。早期基督教则试图教导罗马的底层民众“在弟兄般共享的精神里和物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着手建立上帝王国”^[2],并对他们赋予超越性的企盼。如果说,这些离现代共产主义的前景已十分遥远,那么在当代激进左派中,同样有人从柏拉图理念论的立场看待共产主义。面对市场普遍化与文化相对主义带来的现代生活的堕落,巴迪乌坚称“共产主义”是永恒真理,是具有范导功能的“理念”,只有重新开启“共产主义假设”,即“劳动对财富和统治的屈从并非必然”这一假设,才能创造现代历史进程的转机^[3]。诚如伯尔基所言,没有观念论的遗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将是无法想象的,那么马克思又为什么要拒斥观念论,选择唯物主义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在于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是一个基本现实而非抽象观念。人们总是将现实等同于经验现实。但是当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说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而为了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4]他实际肯定了一种最深层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现实,即人之自由的存在,而共产主义则应被理解为一种与人之自由本质相关的社会的基本构造。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而言,必然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这一看法实际具有双重意义:第一,个人只有在社会中生活才能超越自然本能,学会自我约束、自立法度,以此赢得改造世界的自由和力量。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6]。第二,社会的丰富内容、活力取决于个人禀赋的发挥,“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与此同时,个人的特殊禀赋、兴趣又只能在社会的支持下发展——人们彼此需要、相互扶持是保证个人自由发展不至于变成自取灭亡的前提。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的自由在本质上具有一个“共产主义”的结构,它可以概括为自由个性、互惠互惠,以及为了实现这两者对社会关系进行的自主调节。就此而言,可以说共产主义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潜在现实。正像萨拜因描绘的那样:希腊人已经发展了多才多艺的一面,但他们的行业和爱好

[1][2][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0页,第35页。

[3][法]巴迪乌:《共产主义假设》,〔上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0年第8辑。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29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50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页。

却始终以城邦为中心,并且正是个人对城邦生活的贡献有效维护了他们的自由^[1]。可见,希腊人的生活已经显示出:共产主义是社会的本质,而社会的本质是现实的东西。显然,马克思也是因为捕捉到了这一点,才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赞美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并且宣称:成年人应该“努力在一个更高阶段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2]。

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向还伴有深刻的政治哲学理由。现代社会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对个体欲望的辩护为起点。这种片面的个人自由观点已经威胁到了社会生活的根基,而具有自我反噬的特征。与此相反,莱布尼茨、康德等近代观念论者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重建社会的意图。因为观念论说明了人类理性的同构性,从而为人类认识和行动的统一奠定了思维基础。近代观念论最终被黑格尔继承并改造成了关于社会生活的可理解性和可控性的深刻观点。黑格尔认为个人的需要、行动、相互关系在根本上取决于概念范畴对经验的加工和重构。由于人类的概念思维具有同构性,因此个人的特殊意见、社会的特定领域从本源上看能够被他者理解和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提出国家能够通过君主、行政官僚、立法会议等制度设计,超越市民社会(市场)的自发状态,对社会整体运行和个人参与社会的方式加以认识和指导,从而使个人与构成其根本利益的社会(国家)达到自觉、自由的统一。就黑格尔学说的理想色彩而言,它实际与共产主义非常接近。

然而,富有趣味的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坚决拒斥了黑格尔的国家观。并且正是从这一刻开始,马克思决意将其政治思想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尚未完成)。诚然,观念论有助于说明个人相互理解、共同行动的思维根据。但思维的同构性却不能代替个人的自主意识、自主行动,甚至思维能力也只有借助后者才成为现实的思想。从根本上讲,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过分迷信思维同构性,而轻视了现实个人的自主性。作为“思维同构性”的承载者,据说掌握全局知识的官僚被黑格尔赋予了支配社会的权威,然而个人的自主性却未被有效整合进国家的政治生活。黑格尔的国家实际奉行的是“知识的等级制”,普通个体由于缺乏全局知识而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政治缺少监督和主动变革的动力。对民众来说,国家是徒有“理性”虚名的僭政。对统治者而言,国家则是他们个人自主性的俘获物,是“私有财产”。观念论声称普遍理性(知识)创造、支配现实世界,其政治纲领只能通过少数优选者的统治贯彻,这使它无法真正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共契关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将目光转向了唯物主义,转向了市民社会中的现实个人。马克思注意到,伊壁鸠鲁宣称:世界是众多原子自我运动、生成的产物;单个原子的偏斜、排斥使其自身具有了相对意义上的“定在”,即原子脱离了自身抽象的个别性,成为具有“质”的、生成现象世界的“元素”^[3]。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唯物主义观点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它表明个人的现实意志和职业活动生成了社会共同体。马克思最初的“民主”思想(共产主义的雏形)正是以此为起点。因为相信社会是个人发挥自主性的产物,所以对社会的整体调控也应反映个人自由的原则和目标。这也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说的:“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通过实质性的联系,通过个人的基本特质而同个人联结在一起。它们是个人的基本特质的自然行动。”“在民主制中,国家的制度、法律、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4]可见,正是因为相信个人的自主行动构成了共同体的基础,所以青年马克思才将建立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民主制”视为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最终出路。

[1][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1页。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最普遍的误解,就是将其视为一种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目的论历史观和由社会科学知识担保的历史预言。由此出发,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攻击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本质主义”和“整体论”的危险,并且认为,后者通常怀抱“对知识的非分要求”,指望运用关于社会历史的一般性知识蛊惑人心,但在事实上却“不再能够与确实复杂得多的现实世界挂钩”^[1]。更为严重的是,在波普尔看来,“本质主义”和“整体论”必然为国家极权和“干预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因为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承诺为新的“社会体系”和计划提供了合法性,同时也确立了新体系代理人干预政治经济生活的无限权力。波普尔宣称,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以此扼杀了社会的开放性,并在实践方面排除了言论自由、多元主义等政治原则和目标;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仍然是一种为“封闭社会”和极权政治背书的“部落主义”思想。波普尔的学说在意识形态争论中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它回护了20世纪几经动摇的自由主义理想,同时又将人们刚经历过的恐怖经验嫁祸给了他的对手。然而,抛开意识形态因素,波普尔的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实际既没有在学理上认真对待其对手,也没有解决它所提出的“自由与社会开放性”的问题。

事实上,正是启蒙和自由主义传统促成了马克思早期对伊壁鸠鲁的关注。波普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封闭性”和“极权主义”指责其实毫无根据。甚至按照柄谷行人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倒是与反对“部落极权”的伊奥尼亚社会具有隐微而重要的联系。特斯达尔的《新不平等起源论》指出:在游牧采集民时代,由于社会流动性大、社会组织脆弱,超出社会成员允许范围的支配-被支配关系和剥削是无法存在的^[2]。随着定居生活的发展,雅典等希腊城邦开始出现由权力和财富集中造成的支配-被支配关系。但与多数希腊城邦不同,伊奥尼亚社会却表现出了向游牧采集民的个人自由精神复归的倾向。因为伊奥尼亚作为希腊殖民地恢复了人口的流动性,而流动性正是自由、平等的前提。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生活强化了人对人的依赖,形成了支配性的政治经济权力。但是,殖民地社会却建立在自耕农、大范围贸易和手工业的基础上,移民的流动性使伊奥尼亚各城邦无法形成门阀垄断的政治极权和贸易。不仅如此,伊奥尼亚人还通过自发形成的“评议会”处理公共事务,从而遏制了行业利润和阶级权力的分化^[3]。柄谷行人注意到,伊奥尼亚哲学正是其社会的反映。这种哲学主张物质自身运动和自我生成,强调感性知觉对认识的意义,其根据正是伊奥尼亚发达的工商业经验。作为对世界的自然主义解释,伊奥尼亚哲学在理论上排斥了代表支配性权力的诸神,承认了个体自由的本原性;与此同时,通过诉诸个体经验的认识论立场,这门哲学又表达了伊奥尼亚城邦较少轻视职业技术,尊重个人劳动和交换的价值观^[4]。事实上,马克思给予高度关注的“原子偏斜”思想正是继承自伊奥尼亚哲学的物质运动和自由观点;再考虑到他对阿那克萨哥拉(伊奥尼亚哲学家)从物理学角度消除希腊人对天体(支配城邦的神)的恐惧以解放个人心灵的肯定^[5],则可以断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与伊奥尼亚的个人自由精神具有本质上的联系。

进而言之,波普尔对“开放社会”的定义包含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对自由个性这一价值的尊重;第二,通过个人自由来保证自由,也就是民主。从《博士论文》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看,马克思很早就

[1][美]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法]特斯达尔:《新不平等起源论》,山内旭译,〔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3]参见〔日〕柄谷行人:《哲学的起源》,潘世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版,第34-37页。

[4][日]柄谷行人:《哲学的起源》,潘世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版,第3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8页。

是开放社会的拥护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表述中,马克思更是坚持:“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2]马克思甚至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定义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亦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从这些表述看,伊壁鸠鲁的唯物论个人主义几乎同时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基础和政治哲学原则。只不过,在伊壁鸠鲁那里,个人自由的最高表现是摆脱相对性,对世界漠不关心的希腊艺术中的众神;但对于马克思而言,个人虽然具备自为目的、自我运动的本性,但是这一本性只能在对象化即相对性中转变为现实。历史唯物主义正是由此出发,将对自由和社会开放性的思考引向了更深的层面。

在对象化的意义上把握自由是典型的现代洞见。它把人的创造性与自然的无穷偶然性和多样性连接在了一起。自然的无限性由此转变为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并借以表现其自由的无限可能性。马克思注意到:个人自由之所以在现代被看重,正是因为它鼓励个人凭借自身的禀赋、兴趣和才华展开对自然的多样探索和利用;并且由于个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在根本上只能以社会性的文化和劳动为中介,“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才是存在的”^[5],所以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无限可能,也同时意味着个人建立自身社会关系的无限可能。在此,马克思显然认为个人自由发展与社会关系自发革新是社会文明、开放的必然要求,但是他却并未满足于这种个人主义观点。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和近代个人主义都存在对社会联合重视不足的问题。伊奥尼亚人因为没能建成有效的联邦而毁于波斯蛮族入侵;资本主义则因为执迷于个人的私有财产,而使社会屈从于资本增值的逻辑。这些都表明,个人自由虽然是社会文明、开放的基础,但如果缺少有效联合,它也将走向自身的反面。黑格尔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试图在思维同构性的基础上揭示人类社会联合的条件与方式,并赋予现代国家以凝聚社会共识、调节社会运行的职能。黑格尔以此开创了人类“有计划地统辖社会”的思想先河。马克思、列宁实际都受惠于黑格尔的思路。不过,黑格尔的社会联合思路也存在缺陷。因为黑格尔将社会的联合完全置于人类思维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自然不具有独立的本质,因此个体对自然的认识、利用以及由此造成的个别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也不具有本质的重要性。对黑格尔来说,一旦人类精神认识到自身能够凭借概念思维理解和掌控社会运行并建立起承担这一职能的国家机构,历史就终结了。黑格尔的社会联合方案实际是一个封闭的观念系统,它无需根据特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做出任何现实调整。也正因如此,黑格尔才会草率地相信封建君主、官僚和同业公会能够胜任管理现代社会的任务。

就此而言,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际蕴含了在政治哲学上重新综合个人自由与社会联合的深刻意图。首先,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指明:历史活动是个人或者说群众的事业,伴随着众多个人的自发实践,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个别关系将不断发生历史变化,这种变化无法被任何一种封闭的观念系统和理性计划完全覆盖。其次,马克思又指出:个人行动的自发性及其相互作用,使他们共同造成的客观联系和社会力量“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的支配”^[6]。因此,通过联合将社会生活过程置于个人的共同意识和计划的控制之下,对于争取自由而言是绝对必要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要求尊重个人自由和社会历史的开放性,又渴望揭示社会计划的合理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第14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限度和自我调整机制,这两者最终促使它提出了“自由联合”的社会组织原则。具体来说,马克思承认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行动只有在某种共同观念和计划的引导下才能相互结合,成为真正实现了的自由本性。但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专制和社会联合计划的封闭性,马克思又强调作为“自由联合”的共产主义制度,必须“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并将个人过去被迫的、超出其自觉意识的社会交往转变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1],从而通过吸纳个人的自主性,确保社会联合的计划能够全面掌握社会运行的信息,并且保持该计划在观念系统和组织形式上的开放状态。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方案又不同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它的目标不是建立个人获取和保全私利的政治法律基础,而是将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交往和生产力条件置于他们的共同支配之下。因此这种“联合”最终将建立起来的是个人对于自然、社会乃至人性的更加全面的关系,而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2]。

事实上,像马克思这样回归唯物主义立场在政治哲学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希腊哲学终结时,伊壁鸠鲁就没有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这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而是将其学说进一步追溯到最简单的自然哲学,以为新型的个人自由奠定基础^[3]。也正因如此,伊壁鸠鲁的学说才会在霍布斯等现代性的开创者那里获得复兴。马克思不仅深知这一点,而且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之后,他所做的正是同样的事情。为了确证个人自我决定、自由发展的价值,保持文明的活力,马克思不惜牺牲近代认识论追求的哲学反思性,重返一种更具独断色彩的唯物论个人主义立场。与此同时,马克思又比任何人都清楚个体自发性的限度,并强调尽可能将个体自发性纳入自觉的联合计划之内,以守护文明的社会基础。马克思正是由此第一次在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基础上综合了观念论对于“有计划社会行动”的思考,从而为解释和引导现代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真正具有深度和开放性的政治哲学纲领。

[责任编辑:曾逸文]

The Motiv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ian Guanbao

Abstract: Marx had his profound motiv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establish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the one hand, with a deep understanding that individuals' self-determination and free development are the driving forces for civilization, he accepted argumentation by Epicurus for material individualism; on the other hand, he had a better knowledge of the limits of individual spontaneity than anyone else, attempting to absorb German idealist thought on “human's planned dominance of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ism. It is by virtue of this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nages to integrate such two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as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ocial union”, thus for the first time providing a guidelin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with both integrality and openness for interpreting and guiding current social changes.

Keywords: individual freedom; free un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picurus; Marx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第84页。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